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作者/Author | 叶祖艺 | YE Zuyi |
| 时间/Time | 2013-03-28 | 2013-03-28 |
| 被采访人/Interviewee | 黄玉娇 | HUANG Yujiao |

叶祖艺（3月28日）

返回之路（4）

今年，2013年，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五个年头。很多人认为，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五年，是决定个人未来方向的五年，甚至被认为是决定个人命运的五年。所以很多大学生在毕业前夕都会为自己制定一个“五年计划”，我同学中的绝大多数人，他们的“五年计划”是在广州、深圳、东莞等城市谋得一份收入不错的体面工作，再接着解决是房、车、婚姻等问题。我呢，当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，只是想离开广州这个城市，在这个地方读了四年书，憋得慌，一种想出走的冲动特别强烈。离开广州，轻松的说法，是去别的地方看看，就像背包客沙发客一样，严肃地说，是寻找自己，想去解决一个形而上的老掉牙的问题。

如今，距离大学毕业五周年的7月1日，还有三个月零六天。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，我的大学同学中，只有少数有家庭背景的人解决了体面工作和房车等问题，剩下的大多数还挣扎在一路飙升的房价之中，望着房车兴叹，至于体面的工作，每个月吃饱饭和交完房租后，有一两千块余钱也就不错了。相比较他们，我先是误打误撞地撞进北京草场地，接触到了影像，然后又误打误撞地撞到吉安青原色，接触到了公益，在经历了被“捡进”草场地，和被“收留”于青原色后，最后踏上了返回村子的道路。

其他同学选择的路是跟着潮流走，我选择的路却是逆流而上，两者截然不同，但不存在孰好孰坏的问题，都是自己的选择，相互尊重最为重要。其实，无论是想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我，还是向成人社会标准看齐的其他同学，我们都是一群被社会浪潮裹挟着前进的可怜虫，在一扑一倒的行进中，被灌得满腹苦水，深感现实的苦逼、人生的无奈。我们就像蜗牛一样爬行在死亡的道路上，至于是死在城市的公路上，还是死在乡村的泥巴路上，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况且我对自己要在乡村的泥巴路上走多久，我也不知道，只能说现阶段是如此，是回到村子里去。

我返回的村子叫“寨下村”，一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，也是祖祖辈辈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。如果生命真有所谓的“起点”和“终点”，那“寨下村”就是我生命的“起点”，至少从地域上来说是如此。也正因此，我现在走进村子的动作被称为“返回”，意即回到根之所在地。

我的村子位于粤东北地区，房屋扎堆而建，沿河靠山，典型的客家风。放在十多年前，我还会用“依山傍水”、“绿水青山”等词来形容自己的村子，因为那时的山，绿树成荫，是我们小时候捉迷藏、玩打仗的好地方；那时的河，水流湍急，常有大山深处的人家驾着竹伐顺流而下，我们这些小孩在浅水滩处等待，一看见竹伐，就争先恐后爬上去，等竹伐到了下游的“码头”，我们才满心欢喜地上岸离开。但现在，河已成溪，山也成了黄土丘陵（近年来，村委以种茶叶为名，卖树挖山，一片黄土。）

村子现有人口4000多，全部姓叶，客家人。房子90%以上是钢筋水泥房，一层两层三层，正门口贴上瓷砖，楼顶立着不透钢水塔、太阳能热水器、电视接收锅。村道被铺上了水泥，小车能走，大巴也能走，即使两辆车相向而行，挤一挤，挪一挪，让一让，也可顺利通过。道路两边都装上了路灯，晚上六点入夜，灯即亮起，至深夜十一点灭，电子控灯，全自动。

我们这里以种植水稻为主，春秋两季，即早稻和晚稻。早稻于清明节前后插秧，过小暑即收割，晚稻在早稻收割一个星期后插秧，寒露时节收割。种出来的稻谷主要是自给自足，一般不卖买。农田多在大山深处，一块块的稻田，沿着山脚下溪水边，从坑口到坑尾，连绵不断。这里说的“大山深处”，是以我家田地所在的“梅塘”为中心，远至“三十六休”，近至“茶亭”。从村子去“梅塘”，要走至少一趟路（一趟路为五公里）。因为路途远，又要经常上坡下坡，所以在水稻收割之季，我们通常天蒙蒙亮就要起床，早早吃过饭就上路，为的是赶在太阳热起来之前多干些活。

在我记忆中，去“梅塘”割禾被太阳曝晒是常有的事，因为我不喜欢戴草帽和斗笠，就这样顶着太阳干活，晒累了就到溪水里洗洗泡泡，然后再回去接着干。有一次我在太阳下晒了一整天，头脸脖子手臂的皮肤发红发烫，疼得连温水都不敢碰，几天后皮肤开始蜕皮，我去撕时，能撕下一大片来。还有一次是上大学后，2005年的暑假，我回家帮忙收割稻谷，完事后回到学校，一同学拿相机拍照，我看到照片中的自己，黑不溜秋的，堪比非洲人，与身边的女同学形成鲜明对比。当时我自卑呀，就赶紧卖来男士美白洗面奶，早中晚各洗一次，暗下决心要去掉这层皮，同时做出另一个重要决定：从此不再回家割禾。

打那以后，我真没回家割过禾，以致后来听母亲说“梅塘”的田没人耕全荒了时，我都不敢相信。现在的村人，别说远在五公里之外的“梅塘”不去，就是近在两公里之内的“杨梅坑”都不愿意去，只是守着家门口的一亩三分地，得闲就种种，不得闲就交给别人去种，或者卖给别人盖房子，自己就出去打工，或做点小生意。村里人常说这样一句话：“在家里耕一年的田，抵不过在外面打一个月的工。”

种田这一过去的主要劳动方式，也是村人的主要生活方式，现在变成了村里人可有可无的闲活。田地呢，被荒废，被卖买，被用来盖房子，也一样成了可有可无之物。“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”这一句话，或已成为历史。

我这个多年没有下过田的农村人，因为多读了几本书的缘故，身上不免沾有几分小文艺青年的气息，面对村子田地的变化，既感伤，又惋惜，却也无可奈何。我甚至悲观地认为，我父母一辈是最后一代耕田人，即末代稻农。像我们这些80后、90后，会有几个人回到农村去耕田呢？再过若干年，我们这些人会不会耕田都可能成为一个问题。回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不免又有几分“沧海桑田”之感。

但村里其他人可不像我这样想，尤其是经历过“人民公社化”的老一辈人，在我采访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多数认为，现在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，不但耕田不用交公粮，还有钱补贴，以前耕了好几亩田都不够吃，现在不耕田都不会饿肚子，现在的时代最好了。在这些老人中，又以黄玉娇老人最让我印象深刻。

黄玉娇是我现在的邻居，从我家去她家也就一百米的距离。她告诉我，她出生于1935年，七岁被抱来做童养媳，换了七担谷，一岁一担谷。解放后，因受不了前夫的打骂，就与之离婚，嫁给现在的丈夫，叶恒钦，也是1935年出生。在她的讲述中，给我印象深刻的，不是她讲自己以前有多苦，而是关于“公社化”插秧的事。

她说，以前的谷是撒下去的，不是插下去的，那架机走多快就撒多快，撒得很厚，全部冇割，后来就用火烧。“上面号召什么做就什么做，你冇权的。”又后来坐着插秧，坐在秧船里，那个船就跟电视里看到的船一样，不过没那么大，只能坐一个人，里面放满了秧苗。那些田先耙烂，每人一架秧船，好比这里插完了，用力一推，就到后面插了，不用脱鞋袜的。插的秧密密麻麻的，很窄，只有食指那么宽。这是上面规定的，大队干部要拿尺去量，一行行地量，如果你插得不正式，过宽，就要扣工分。

黄玉娇讲的插秧方式，我是闻所未闻，犹如在听奇闻异事。我记得自己以前和家人去田里插秧时（每逢插秧收割，我家、二叔家、三叔家都会一起出动，谁家的田准备好了就先干谁的），大人是三叮咛四嘱咐，要我注意秧苗之间的距离，不能太密，因为太密了，空气阳光进不去，秧苗就长不起来，就会冇割，但又不能太宽，太宽了就浪费土地。我小时候常常因为把握不好秧苗之间的距离，被“踢”出插秧的队伍，只能干些“后勤”工作，如“拨田”，把泥巴从高处推到低处，使之平坦如地，又如“铲秧”，看到哪个大人后面没有秧苗了，我就得到秧田里铲秧，用畚箕装好担到他们身后，还要摊派开来，以保证每一个人都不会“断货”。用我母亲的话来说：“看到差不多冇秧了，你就要去铲，你要让每一个人插秧插得头都抬不起来。”

干这类“后勤”工作的，不止我一个人，还有两个堂弟。三个人中，我最大，欺负小的干活是我当时经常干的事。如果他们不听话，我们之间就会展开一场“泥巴仗”。我以一敌二，“战斗”一打响，“炮弹”就飞向对方，这时，转身护脸是最重要的，身体其他地方“中弹”都无大碍。但“炮弹”往往扔出没几个，胜败还远未见分晓，大人就前来搅局了，尤其是双方母亲，骂得最厉害，因为她们累了一天后，第二天一早起来还得清洗我们衣服上的“弹药”。

回想起自己以前和大人下田插秧的情景，因为把握不好秧苗间的距离，被迫干“拨田”和“铲秧”的活，以致污泥满身。现今听着黄玉娇老人说，以前秧苗间距被规定成食指般大小，为达到这个标准，插秧不下田，坐在秧船里，连鞋袜都不用脱，最后还要拿尺子去度量。我真觉得不可思议，天底下竟还有如此耕田的。但在那个荒诞的年代，再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比如饿三千多万农民的“三年饥荒”，就在那时候发生了。

回忆起“饥饿”，黄玉娇说，当时家里的粮全部被担到公社去了，“个人家里不准出火烟，要到食堂去吃。”吃完以后呢，田里种的禾又冇割，后来就吃番薯片，又后来吃树叶，杨藤叶（音）、布菜（音）、狗贴耳（音）、山酱树叶（音）。饿死了，那个时候，饿死了好多人。

“何木龙有一个人吃了十二半斤番瓜，吃到肚子好大，你说死不死，当时他吃出了名，死了都有人去参观，他的名叫做粟章。”黄玉娇说。

我问这个叫粟章的人的具体情况，如哪年出生，哪年因饥饿被撑死，当时吃番瓜的具体情形，人们去参观的场面等等。黄玉娇说她也不知道，她当时没去看，是听人家说的。

随后她又讲到另一个因吃东西而撑死的人：“又后来上山掰（挖）竹笋，去梅塘那个竹山呀，去那里掰竹笋，经常去掰。掰归来吃了发肿，竹笋好寒的，朱仔就吃死了，他吃了很多，刚煮熟就吃，冇盐油的，吃了很多就死了。”

“朱仔”这个名字我听过，之前有好几个老人跟我提过，他的全名叫叶佐朱，生于1910年，死于1960年。他死前，据一个叫曾漫的老人说，当时叶平漠的父亲叶升活死了，村里人正打算抬他上山下葬，叶佐朱从家里出来，说：“我去看看阿活哥有多排场。”谁知叶升活还没被送上山，才走到半路，叶佐朱就死了，大家又赶紧回来埋他。

“饿死了好多人，那时候。唉，不去讲了，讲起以前就苦，苦死了。”黄玉娇老人说到最后，这样感叹道。我也不好意思再叫她讲下去，就陪着她一起沉默。

“还是你们好，逢到现在这个好时代，有工打，不用耕田，现在的时代最好了。”沉默一阵后，黄玉娇又发出这样的感叹。

看着眼前这个回忆过去感到痛苦、想到现在充满羡慕的老人，我忍不住这样去安慰她：“阿婆，你不用羡慕我们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苦，你们以前是苦于冇吃，饿肚子，我们这一代人是苦于这里（我指着自己的脑袋），精神上的饥饿。”

对于现在这个“不用耕田”的时代，也有认为它不好的老人，这个老人叫叶宣华，生于1943年。我采访他的时候，问起“饥饿”，他也谈了过去耕田冇割的事，认为这是主要原因之一，然后又讲到现在大家不耕田的事。他认为，现在农田荒的荒，被用来盖房子的盖房子，大家都不耕田，以后哪来吃的，照这样下去，又会回到跟以前一样冇吃。“这样的时代不是个好时代，哪有农村不耕田的，哪朝哪代都没有过。”

我被这个老汉的想法震住了，完全出乎意料。另外，他还养有一头母牛，带着一头小牛仔。据我所知，他是现在村子里唯一还养有牛的人。

叶宣华问我，说你是个大学生，有文化，你怎么看这个事。我看着镜头前面的他，沉默着，久久不作声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的问题。

那天回来的路上，天快黑了，看着村口不久前被收割完的田野，有几个人在烧稻秆，浓烟滚滚。“你怎么看这个事？”我想着叶宣华问我的问题……